

开 国 省 委 书 长
（下）

KAIGUO SHENGWEI SHUJI SHENGZHANG

文辉抗叶健君 主编

东方出版社

第十九章 四川省委书记、省主席李井泉

李井泉是个文人，当年在省立师范求学时，国文根底扎实的他就常有大作见诸报端；李井泉也是一名武将，自1927年投笔从戎后，他能征善战，运筹有方，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。解放后，能文能武的李井泉出任四川省委书记、省政府主席，又以善于主政地方工作而闻名。毛泽东在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曾当面称赞他：“你干得很好，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！”

一 李井泉扛着从河里捡来的步枪，参加了革命队伍

江西省临川县（今抚州市）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，叫唱凯镇，当地人称唱凯集，集上有仓下村，这个村子以李姓为主。1909年9月19日，已故国家领导人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，就诞生在这里。唱凯集向北乘车几十分钟便是江西省会南昌。

李井泉出生在农村，从小便经受了生活的磨炼，家中兄弟姐妹五人，他排行老二，在农村，这便算是长子，因此，重活累活少不了他。空闲的时候，还得带着弟弟、妹妹们玩耍。这些经历，锻炼了小井泉独立自主的能力。

李井泉的家境不好，父亲、母亲一年四季忙活在那几亩地上，刚够全家人糊口。但有一点，他是幸运的，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，虽然，现在看来，那仅是写字习文而已。李井泉从小就聪明伶俐，深得父亲厚望。父亲望子成龙心切，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，教他识字、读书，刚开始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读本，待他年岁稍长，全家省吃俭用，又送他到抚州念洋学堂。这在那时的乡间，是很少有的。

小时候的李井泉除了功课好外，还爱憎分明，看不惯那些横行乡里的富人。他父亲与附近周博巷村的一个地主很要好，按照旧时的伦理道德，可谓

“君子之交”，李家钱不济时，经常借钱度日。李井泉听说父亲向这种人借钱，不以为然，一再开导父亲：“不要借这种人的钱，他们归根结底是要被人民打倒的！”为此，父子俩不止一次发生过激烈的争执。

李井泉的这些言论，是跟他在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和熏陶分不开的。1924年秋，年满15岁的李井泉离开家乡，走进三师的校门。那时的三师校园，正被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，老师、学生们大都参与了这股热潮。在三师，对李井泉影响最大的当数国语教师章涤昌，章曾经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。他利用授课之便，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；课余还将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、《每周评论》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。在当时的学校里，一切宣传革命的书刊均在禁读之列。学生阅读这类书刊，一旦被校方发现，就有被开除的危险，为了避人耳目，李井泉与舒同、许瑞芳、章应昌等进步同学商议，成立读书会，明为钻研功课、交流心得，暗中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。这批同学中，舒同后来成为著名的“红色书法家”，其“舒体”也独立特行，自成一家。从这时候起，李井泉就开始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。

李井泉在学校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，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，国语水平更是高出其他同学一筹，他的同学舒同，国语水平好，书法也漂亮，两人逐渐成为读书会的骨干。李井泉有许多进步文章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，并且有些被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当众宣读。

在三师，李井泉除学习好外，还非常有胆略。1925年10月，北伐军乘胜攻打临川县城。盘踞城内的是军阀孙传芳的一个混成旅，敌人宣布宵禁，妄图死守待援。李井泉闻讯，立即召集读书会的同学秘密商议，决定采取果敢的行动，支持革命，支持北伐军。当晚，他们趁着夜色，潜出城外，与北伐军指挥部取得联系，制定了里应外合，配合作战的计划。第二天，这些同学分头行动，有的去借梯子，备北伐军攻城之用；有的筹集稻草，制成单架；有的刻印传单，书写标语。

10月19日，北伐军开始攻城，守敌看到满街的标语，误以为北伐军已经进城，军心开始动摇，有的士兵悄悄地开了小差，土豪劣绅们也闻风丧胆，东躲西藏。北伐军发动几次强攻，终于踏着三师学生摸黑搭架的长梯，登上了城墙，将守敌一举击溃，在临川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，北伐军浩浩荡

荡地开进了县城。

由于思想进步，1927年初，由章涤昌老师介绍，李井泉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27年夏，南昌起义军路过临川，一心向往革命的李井泉毅然决定弃学从军，他瞒着父亲，扛着好友黄鑫仔从河里摸到的步枪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南下起义部队，从此，李井泉正式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，开始了漫漫的革命征途。

二 统领游击队驰骋大青山

加入起义部队后，李井泉在第四军二十五师政治部任宣传员。当时的宣传员，须经常冒着枪林弹雨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，到士兵中去宣传革命道理，鼓舞士气。李井泉非常注意宣传的效果，战士们在他的宣传鼓动下，群情激昂，士气大振，纷纷表示：抱定必胜的信心，去和敌人勇敢地战斗。并且，他还深入农村，动员农民参军参战，教育农民帮助起义军，送军粮，抬担架支援前线。

1927年9月，广东大埔三河坝战役后，李井泉留在大埔、丰顺、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，先后担任过丰顺县金铺区共青团区委书记、团东江特委秘书长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开展革命活动，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。1930年夏，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，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送信做联络工作。前委书记毛泽东接见了，他说：“你很年轻，精明强干，又有文化，很适宜做政治工作，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，深入实际，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，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。”这是李井泉革命生涯的转折点，后来一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。随后，李井泉调任红一方面军政委办公室秘书长。同年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井冈山的烽火岁月里，李井泉先后担任许多重要职务，1931年春，任红三十五军政委，1933年，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等。

1934年10月，李井泉随中央直属纵队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其间，因毛泽东受到王明、李德等人的排挤，实际上已不能指挥军队，李井泉因此受到牵连，长征开始时，担任中央直属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，这是一个有名无实、无足轻重的职位。但他忍辱负重，不计得失积极工作，深得战友们好

评。遵义会议后，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。在长征中，李井泉曾先后在红一、红四、红二方面军工作过，两过草地，历尽艰辛，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。

1938年秋，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委的李井泉，率游击支队，北出绥远，在大青山与蒙汉骑兵游击队一起开展游击战争。当时，归绥、包头沦陷，土匪成群，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，整个绥远局面极为混乱。李井泉支队上大青山后，活动于归绥、包头之间的山区。这个地区是绥远的心脏地带，在这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，使日寇日夜难安，因此，日寇想尽一切办法赶走或歼灭我军，“扫荡”与“反扫荡”将是反复、长期的，李井泉作为支队负责人，认真分析敌我情况，为巩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，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：

首先解决抗日信心问题。日寇和国民党军队交手取胜后，气焰十分嚣张，一再叫嚷大青山是防共隔绝地带，绝不允许共产党、八路军在这个地方存在。结果适得其反，李井泉率领的支队，不但开进大青山，还横扫阴山700里，打得日寇焦头烂额，顾此失彼，穷于应付，以事实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，给了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。

二是加强蒙汉团结，壮大抗日力量。大青山是蒙古族聚居的地区，国民党时期，由于民族政策失误，民族隔阂较深。李井泉率领支队上大青山后，十分注重民族工作，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，连王公贵族亦在团结之列。如我军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，全部俘虏了四子王旗的保安队等伪军180人，我军在讲述了民族政策后，全部释放了他们，连枪支也如数发还，这件事情震动了塞外各盟旗。此后，很多蒙古上层人士和佛教喇嘛领袖，都和我军接近，供给马匹，运送枪支弹药等。

三是迅速建立骑兵部队。大青山地区辽阔，丘陵多，人口少，气候寒冷，游击性很大，要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，没有骑兵是不行的。但是步兵变成骑兵，出现一系列困难，如马匹来源、战马装具、训练作战、供给等都急需解决。以李井泉为首的支队领导，费尽心血，想方设法，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就把步兵全部变成骑兵，完成了骑兵组建任务。

四是整治社会秩序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。李井泉提出，首先建立大青山抗日动员委员会，并且由东向西在大青山普遍建立动委会，各个区

动委会可组织一定人数的游击队，这样，形成党对军政和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。在此基础上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对蒙回民族、国民党军政人员，凡是有利抗日的都在争取之列。这一系列的措施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，如同一把尖刀，刺向日寇，使先前大青山的凄凉景象为之改观，并且形成战略反攻的态势，壮大了自己，打击了侵略者，为抗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作为游击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李井泉也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，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

李井泉的工作得到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，抗战胜利后，李井泉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，领导了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。1948年，兼任二十兵团政委后，又为保卫晋绥根据地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此时的李井泉，年近不惑，年富力强，经过革命战火的考验，在政治、军事、地方工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他正为迎接革命新的高潮，踌躇满志。

三 毛泽东说：“你干得很好，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！”

1949年冬，李井泉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，参加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，和贺龙、邓小平等在一起，为我国西南地区的解放与发展，呕心沥血，艰苦奋斗。

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之地，也是最后覆灭的巢穴。蒋介石在逃离大陆时，把许多军统特务和部分残余势力全部留在西南地区，这股反动武装和农村的地主恶霸、土豪劣绅等封建余孽勾结在一起，到处烧杀抢掠，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，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。李井泉于1950年初，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、军区政委，兼行署主任。1952年秋，又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、省军区第一政委兼省政府主席，西南局第三副书记。他领导四川军民进行了清匪反霸和土改的伟大斗争。

李井泉在战术上非常注重主动性。他密切联系群众，深入调查研究，深入部队、农村，依靠工农与土匪特务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，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反扑，把他们赶入深山老林，并予以彻底消灭，粉碎了敌人企图复辟的梦想，巩固了新生政权。在农村，李井泉依靠贫雇农，



1949年，（左起）刘澜涛、程子华、李井泉、赵振声、谭政、罗瑞卿、贺龙等在西柏坡。

团结中农，斗倒地主，消灭了还乡团和地主武装，把土地分配给农民，使劳动人民真正地当家做主，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李井泉从1952年至1965年任四川省委书记，1952年至1955年兼任四川省主席，在人民政权稳定后，他贯彻中央提出的“积极发展，稳步前进”的方针，并根据四川地区的实际情况，提出“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”，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把大搞水利和机电提灌相结合。平川地区江河交错，水源充足，通过发动群众多挖沟渠，改造旧河道，使之成为网络化的灌溉系统，旱能浇灌，涝能排水，旱涝保收；山地丘陵区，坡地多，梯田多，地势高于江河而水流湍急，多峡谷，这种地势，采取建库蓄水，提高水位，建坝发电，以电提灌，变旱地为水田；特别是重修都江堰，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，粮食产量不断提高，使四川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天府之国”。毛泽东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，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，连声称赞说：“你干得很好，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！”

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，恢复农业生产是最根本的事。旧中国留下来的烂摊子，需要一步步地收拾。

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，中共中央决定从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，

支援其他比较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。李井泉从大局出发，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，服从全局，帮助国家渡过难关。当时，四川内部主要有两种论调，一是说李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，向中央表功，捞取政治资本；一是说四川乃“天府之国”，才拨那么点粮食，是小家子气，与中央闹本位主义。李井泉顶住各方面压力，实事求是，坚持只能调 300 亿斤，多了不依，少了不行。

四川省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、60 年代初，经常有粮食支援外省。1962 年，毛泽东向李井泉询问粮食情况：“今年的年景如何？”李回答说：“可能增产 50 亿斤。”毛泽东说：“你们就是增加了，也不要支援那样多！”1965 年，毛泽东在听完李井泉粮食汇报时，又谈到中央调拨粮食：“要懂得大公无私，又要懂得大公有私”，要李井泉实事求是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。李井泉一开始便是按这一要求处理事情的。

20 世纪 50 年代末、60 年代初，四川的经济工作中，曾经有一个“唱川戏”的说法，这是李井泉首先提出来的。“唱川戏”是与“唱京戏”相对而言的，意思是在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时，要结合四川的实际情况，要有创新，要有四川的特色。这在当时的经济实践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作用。具体“唱法”是：

一是在 1961 年开始在部分煤铁矿山试行工资奖励制度。它的全称是：“计时工资加奖励与包产相结合”，简称“定、包、奖”。四川当时工交企业职工的工资长期存在着“一低二平”的缺陷，奖金额一般平均只占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几，完成不完成国家计划都可以得奖，调动不了职工积极性。工资奖励制度的执行，使生产工效显著提高，国家计划月月超额完成。并于 1961 年下半年起，在采煤、采矿、冶炼、运输等行业普遍推行。这对当时缓解职工生活困难，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，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。

二是干部参加劳动实行“三定一顶”的制度。在 60 年代初战胜严重经济困难努力中，四川省委十分重视抓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。一时间，蹲点调查研究，机关干部种试验田，企业干部参加劳动蔚然成风，并逐步形成制度。“三定”即干部参加劳动固定时间、固定岗位、固定职责；“一顶”，即在技术水平提高、能够独立操作以后顶替班组定员，于 1964 年初，由重



1951年，李井泉与少先队员。

庆水轮机厂率先创造并随后推广全省。

三是“两基”工作，即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和职工大练基本功。这是根据四川一些企业在1963—1965年间开展的“比学赶帮”增产节约运动中一些好的做法加以总结提炼后在面上推广的。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主要是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，包括班组工作，基层党、团、工会工作，定额工作等。基本功又分为政治、技术、管理三大基本功。“两基”工作在面的推广上不尽如人意，一些认真抓了的企业，效果都比较显著，如成都针织三厂。

四是试行以轮换工为主的“亦工亦农”劳动制度。四川省在1964年上半年布置开展“亦工亦农”劳动制度试点工作。其初衷是统筹安排城乡劳动力，缓解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困难，更好地解决工人接替问题，可以减轻企业在福利设施、服务事业方面负担，避免职业病的发生，有效地保护劳动力。

五是工农业互相支援的“厂社结合”。多年来，四川各级领导在坚持“以农业为基础，以工业为主导”方针的工作中，一直在探索工业支援农业的具体制度和办法。“厂社结合”的具体办法是：在坚持两种不同所有制、分别核算的前提下，工厂同公社建立固定联系，大厂带大社，中厂带中社，



四川百姓热烈欢迎邓小平、李井泉等。

小厂带小社，在生产建设、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相互支援。

以上俗称“五本折子戏”，在当时的情形下，对经济发展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，也显示了四川省领导班子的精明强干。虽然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便逐渐废除或解散，但其历史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。

李井泉除了在工业、农业恢复和发展上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显著成效外，还善于密切联系群众，为百姓排忧解难，使得他在四川有“知心人”的雅号。

解放初期，相当一部分老秀才在政府和其他事业单位中服务。这些老秀才，在当时说来是较高级的知识分子，加之国民党逃跑的时候，带走不少人，这些老秀才的作用就愈显得重要。

但是由于他们是旧社会的文化人，带着旧社会的某些特征，因而受到许多同志的轻视，认为他们是封建社会的残余，是保守落后的典型，再加上这些人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不再有雷厉风行的办事劲头，因此有很多单位纷纷裁减老秀才。

暮年失业，生活无靠，老秀才纷纷陷入困境。

李井泉主政四川伊始，便遇到了这一问题。他走访了几位失业的老秀

才，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。

那天，他刚一进门，说明来意，那位老人便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，连伸了几次手作“请坐”的姿势——要知道，在旧社会，省长就是巡抚，如今巡抚大人亲自驾临老秀才的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

李井泉一边与他拉家常，一边四顾这“书香门第”，发现这里其实住不得：屋里最大的物件是一张老式床和一个落地大书架，床上的蚊帐是补了又补。

他与老人谈了很久，发现这位秀才虽老，但是谈吐得体，思路敏捷，而且思想也相当开明，不像传言的那样是一个思想僵化的封建卫道士。

在讨论老秀才问题的会上，李井泉进行了逐条分析：

1. 这些老秀才一般有较强的知识水平，目前我们同志中赶得上的很少。

2. 这些人当中不少是开明人士，拥护党的政策，并不是像某些同志说的那样是封建卫道士。

3. 这些人曾经为我们工作过，我们不应忘记他们，不能委屈了他们。

经过讨论，与会人员一致认为，老秀才们对我们的事业是有过一定贡献的，而今他们生活有了困难，应该予以帮助和解决，并适当给他们安排工作，让他们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。很快，老秀才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长期战争带来的影响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，往往食不果腹，人民体质较差。而且，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落后，卫生环境不好，钩虫、血吸虫病一时蔓延。

疫情一天紧似一天，李井泉果断决定，立即成立四川省钩虫病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。他亲自到病区，与工作人员一起了解情况，掌握各种资料。身边的工作人员担心他染上病，劝他不要去，他一句“顾不得那么多了”，连头也没回，疫情得到控制后，他作了深刻的思考，得出一方面是环境因素，一方面是人民的体质太差，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太低。

于是，一系列政策、措施出台了。

作为四川省的一把手，李井泉呕心沥血，策划了一系列重大举措。川中油区的第一井天然气，宝成铁路建成，成昆铁路通车，重庆、成都等一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等，无不浸透他的心血。

李井泉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横遭迫害，始终保持了忠诚的节操，当“造反派”用酷刑逼迫他揭发邓小平、贺龙二位同志时，他大义凛然地说：“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人，毛主席都说他是个人才。”当说到贺龙时，他心情激动大声说道：“我认为在党内重大斗争的关头，他始终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边的，如遵义会议、庐山会议等。毛主席曾贺贺龙是一员虎将，很会打仗，很具有军事才能。很受群众的爱戴，这就是我对贺龙的总印象。”

恢复工作后，李井泉不顾年高体弱，深入调查研究，每年都到外地进行视察，深入农村了解民情，关心社队企业的发展。在党的十二大上，李井泉主动提出“让位于贤”，退居二线，并倡议全体老同志都应退居第二线，把年轻同志推到第一线，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，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晚节。

李井泉生活朴素，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，一身衣服，穿数年，破了补，补了又穿。有一次，管理员看到李井泉屋里挂的窗帘破旧，打算换个新的，李井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不要换，你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国家的经济还不富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，要发扬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、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。不要忘记过去，要时刻想到人民。”

李井泉严于律己，对亲属要求也很严。1977年10月，李井泉回到故乡，下榻抚州地区招待所，许多亲戚赶来求见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，希望李井泉帮助解决。对于这些要求，李井泉的原则是：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，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。他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亲属：“要自力更生，不要依赖政府，也不要依赖我。”他还一再交代县里和公社的干部：“对我的亲属，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，其他的事不要理睬。”同时吩咐招待所：“我的亲属在所里用膳，记在我的账上，由我付钱，不要把地区招待所变成李家祠堂。”

老年的李井泉，对故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十分关心那里的发展。1979年，在江西视察时，群众向他反映临川大江因为没有大桥，大家办事走路很不方便，且每年洪水要死伤不少人。李井泉听了反映后，当即召集有关干部拍板定案修建一座“万年桥”。桥修好以后，两岸百姓欢呼不已，并赋诗一首，以表心意：

万年桥复通，
开国大功臣；
掌权不忘民，
井泉万年松。

第二十章 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

1949年11月，贵州解放了。

地处中国西南部的贵州，素有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”之称。当踏上这块荒凉土地时，苏振华以贵州第一任省委书记名义发誓，要征服这个贫穷落后的“夜郎国”，让这里的人民过上好日子。

苏振华是深知穷苦的滋味的。因为，尽管如今苏振华已是权倾一方的“封疆大吏”，但是他曾经也是一位雇农家的孩子……

一 毛泽东称赞他是工农知识化的典型

1912年6月2日，苏振华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雇农家庭内降生。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，穷得叮当响的苏家再也承受不了新添的这张嘴，一生下来母亲就忍痛要把他淹死。

苏振华的命在祖母的哭求下，总算保留了下来，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七，没有什么文化的父母给他随便起了个名字叫苏七生。

苏振华6岁就开始放牛割草，7岁就上山打柴，8岁那年便跟大人们一起下田插秧，到了10岁他就能扛起锄头独立挖茶山了。他为了挣每月三升米的工钱养家，给地主放鸭，却遭地主的儿子侮辱、毒打。苏振华很懂事，小小年纪就担起了一个男子汉的责任。

山区平江地处闭塞，但得革命风气之先，是中国革命发祥地之一。毛泽东亲自培养了平江第一批党员，1923年冬建立了平江第一个党支部，是湖南最早建立的农村党支部之一。苏振华的五哥也参加了北伐军，后来战死在南昌城下。

1928年7月22日，彭德怀、滕代远、黄公略发动著名的平江起义，创

建了红五军，占领了县城，平江四方乡众都来响应。

16岁的苏振华，年初参加过平江农民暴动。这时，他找到红五军军长彭德怀，要求当红军。因为年龄太小，彭德怀没有同意，叫他过几年再来。

第二年的秋天，苏振华加入共青团，作为一名觉悟了的战士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。

1930年6月，苏振华遵照共青团组织的决定，带领37名少先队员去参加红军，他再次见到彭德怀。

大了苏振华整整14岁的彭德怀，也是爱吃辣椒的湖南人，早年在湘军服过役，在北伐中崭露头角。

对苏振华，彭德怀还有印象，一见面，他就和蔼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苏七生。”苏振华有点紧张，生怕再遭拒绝。

“已经是红军战士了，取个新名字吧！”彭德怀略一思索，说：“叫苏振华，你看好吗？”

振华，振兴中华之意。就这样，苏七生改名苏振华。他被编入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三连当战士。

这一年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参加红军后，苏振华第一次拿枪打仗，是随部队攻打长沙。与敌军遭遇，枪声大作，许多战友在前面倒下了，苏振华不免有些心慌，班长叫他一起冲锋，他克服了初战的恐惧，跟着班长冲了上去，沉着射击，三枪打倒了两个敌人。生与死的考验使他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，不久就提升为班长。

1930年到1934年，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疯狂的“围剿”。

苏振华投身反“围剿”战斗，他英勇善战，冒着生命危险驰骋于枪林弹雨中。

从湖南长沙转移到江西宁都后，红三军团发起攻打赖村土围子战斗。苏振华带领全班向敌人冲锋时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臂肘，血流如注，但他顾不上伤痛和流血，继续率全班与敌军交火，终因失血过多，昏倒在地。后来，他又两次负伤。最危险的是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，他的大腿被敌人的子弹打穿，颈部也挨了敌人一枪，差一点丧了命。

因为表现勇敢坚决而且有突出成绩，苏振华于1934年被任命红五师十三团政委。这一年，他还获得红星奖章。战争把他从一个红军战士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失败告终，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，苏振华率部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，踏上长征的漫漫征程。

行军到云南扎西后，苏振华调任整编后的红四师十二团政治处主任，十二团政委是平江老乡钟赤兵。在娄山关一役中，是他救了钟赤兵的命。

1935年2月25日拂晓，苏振华随十二团直逼娄山关，他和钟赤兵带领第一营和侦察排向娄山关口发动猛攻。占领娄山关后，敌军反扑，激战中，钟赤兵负重伤，昏倒在地，苏振华一面扶住受伤的钟赤兵，一面用手枪击倒冲在前面的敌人，他又向冲上来的敌人投出最后两颗手榴弹。二人都有被俘虏的危险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援兵来了，打退了疯狂扑上来的敌人。

在战场上，苏振华就奉命接替受了重伤的钟赤兵的团政委职务。

6月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。会师后，部队给养十分困难，广大指战员都只能吃半饱。

到达两河口时，苏振华得知中央在这里开会，也很缺粮，他便拿来一个箩筐放在路旁，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倒了进去。全团指战员效仿政委，都把自己仅有的充饥口粮，倒进箩筐，送给中央领导机关。

抗日战争爆发时，苏振华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任上。

1936年4月，苏振华被选送进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，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，异常地刻苦。由于他的文化程度低，不能在课堂上做笔记，他就专心致志地听讲，下课后再借来别人的笔记，通宵达旦地抄录。凭借惊人的毅力，他攻克文化和理论阵地，取得优异成绩。

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，毛泽东曾这样称赞过苏振华。11月，苏振华最先被从学员中调出担任红军大学二期二科科长。后来，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，驻地移至延安。苏振华也就随校来到这个革命圣地。

这时的延安，已成为抗日中心，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纷纷投奔“抗大”。“抗大”第四期开学，苏振华由二大队大队长改任一大队大队长。

一大队是一个军事大队，大队政委是胡耀邦。比苏振华小了两岁的胡耀邦，以擅长做政治工作著称于党内，后来担任了党的总书记。二人都是喝湘